

# “二元三型”与“二元三维”

——二元类型的三种模式及其第三维开辟

叶 隽

对于侨易学而言，最核心的建构原则是“二元三维、大道侨易”，这虽然已经道出了原则和基本结构，但仍然必须进一步深入到内部细节处。作为宇宙论原则的二元三维，其好处在于包容性、概括性和结构特征。但若将其具体落实，则仍必须归结到类型学构建。即二元结构的基本类型，譬如这里做出若干模式概括：竞型二元、附型二元、战型二元。虽然其根本都离不开阴阳二元的相互作用，但体现出的基本模型仍然不同。和型二元是一种特殊状态，它可以表现在竞型二元的某种临界情况下，即理想零和的出现。

## 一 和型二元作为零和状态

就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来看，无疑是比较崇尚和谐的。汉代之际，董仲舒有“三纲五纪”之说，其中关于“三纲”称：“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阳兼于阴，阴兼于阳；夫兼于妻，妻兼于夫；父兼于子，子兼于父；君兼于臣，臣兼于君。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阴兼功于阳，地兼功于天。”（《春秋繁露·基义篇》）如果阴、阳二者的关系能够达到一种理想的配置状态，似乎我们就可以把握到先天设计结构的某种关键性的规律所在。

这一思路，进一步引申到政治领域之中，则为普适性的阴阳和，班固就进一步发展这个理论：“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白虎通·三纲六纪篇》）这里就更明确地将阴阳关系说清楚了，不是仅性别而存在阴阳，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次而成为阴阳，所以父子关系、君臣关系也可以阴阳来理解，当然这种比拟并非就绝对正确或合理，但它却给我们提供了理解问题的一个角度。其实，这种求和的思维并非仅存于中国，在东方的思维世界里，这种相近的思路颇类似。譬如印度人讲“梵我一如”、伊斯兰教主张“人主合一”，都共享某种与“天人合一”类似的思维模式，也就是主张二元相合。

和合相关，因彼此能和，所以最终能合。这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状态，但在事实操作当中，这种“和型二元”关系近乎是理想状态的可遇而不可求。以君臣关系论，刘备、诸葛亮可谓典型，正因为三顾茅庐的求贤之诚，才有隆中对的定鼎三分，虽然日后因为是否为了关羽之死讨伐东吴而产生重大分歧，但刘备最后还是意识到自己的决策失误。虽然这种和型二元关系的建构，并未实现最终的三国一统、重兴汉业 ideal，但能在那样的困局之下实现刘备集团的整体崛起，确实是与刘备、诸葛亮的君臣和型二元关系的建构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更要注意的是，这种和型二元关系的建立并非孤立的、简单地存在于二者之间，而是在语境之中的。不考虑当时的具体历史语境，是不可想象的。譬如最初的时候，刘备就必须面临如何处理刘关张三结义的关系和刘、诸葛的关系，在一个更大的语境框架中来定位其视作核心的二元关系。没有诸葛亮的出山与刘备-孔明二元关系的建立，固然不可能有蜀汉基业的奠立；但如果没有刘备-武将群体的二元关系的维护，尤其是关羽、张飞、赵云等一批杰出战将的征战，指望诸葛亮就能“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显然也是白日做梦。应该是，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在处理这种关系上还是有策略、有胸襟、有气象的，譬如刘备对张飞的训诫，诸葛亮借“华容道释曹”对关羽的驾驭等都是精彩案例。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二元关系，其实并非真正恒定的“如鱼得水”，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口头表述而已，究其实质，在权力场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和型二元关系，有的必然只是彼此间利益的相对稳定性调和而已，所以这里的“君臣和”，或者所谓“将相和”（廉颇、蔺相如），基本上都是一种“理想叙事”，其实质乃是附型二元关系，必然是相互依附的关系；或者就是战型二元，权力场中的战斗性博弈更为接近本质，这也是福柯为什么用“权力话语”来表述社会构成一样，或许有些绝对化，确实非常实用；如果能形成竞型关系，其实倒是一种常态，因为权力的被制约或许正是通过这样一种良性竞争状态的形成而达到一种可能被“关进铁笼”的状态。

真正能体现和型二元的，倒多半是在能够超越具体利益之争的文化场域。首先需要承认的是，文化场也是一个权力场的延展次场域，不可能完全独善其身。真正能超越这种场域、利益和规制约束的，往往是那些特立独行、雄视万古而敢于超越的伟人巨子。在文化创造者当中，较为典型的例子，可举出李白、杜甫与歌德、席勒。虽然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但李白、杜甫的交谊并不算太长，而且就现有材料来看，杜甫更加地积极些，两者究竟通过这种交谊达成了如何精神交易过程并完成伟大作品的创造，互动性并不是很明显；尽管如此，杜甫对李白的深情厚谊仍是让人感慨至深，《天末怀李白》谓：“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sup>①</sup>李白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相比较杜甫的情深义重、真情流露，李白似乎更加潇洒不羁、行云流水。但总体

① 总体来说，作为年纪较小者的杜甫对李白似乎更加情思深重，作诗数量更多，譬如《冬日有怀李白》：“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期志，兼全宠辱身。”天宝四年秋，李白、杜甫再聚于东鲁，同到鲁城北访范十。李白作《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杜甫作《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彼此唱和。

来说，两者当是那种“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关系，而歌德、席勒就不一样了，魏玛十年的合作友谊，使得他们不但建立了亲密的知己关系，而且也使得德国古典文学达到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最高峰，当他们以一种竞型二元关系发展出和型状态时，就是一种理想临界点的达致。所以，难怪当席勒逝去之际，歌德有非常异常和悲恸的表现，称自己的生命去了一半，如果比较当初未相知时的冷面相对则可以表现出伟人的真性情。但这种和型二元关系的达致也并非一蹴而就，甚至我们可以说二元关系始终是在转换之中的，它有着一个在“动态中发展”的自然过程。譬如歌德、席勒就曾有“语不近不相往来”的经验，席勒最初曾有过拜访前辈的恭谨态度，但却并没有能达到期待中的效果；直到一次偶然的的机会，两人得以沟通才有此订交。在1794年8月23日致歌德函中，席勒就尝试在宏观上把握对方的思想原则：“您将全部自然视作整体，并使个体在其光芒烛照下沐浴滋生，您在整体丰富多元的不同表象形式中为个体的成立原因寻求依据。从单纯的机体出发，您一步步走向更复杂缠绕的结构，最后走到一切之中最复杂的人，您用整座自然大厦的材料水到渠成地将之创造。因为您是循着自然创造之理再将人来创造，所以您切望窥得它深层隐藏的奥妙。这是一个伟大的真正英雄式的观念，足以证明您的精神是如何地将它全部丰富的思想组成一个美丽的整体。”<sup>①</sup>这才有了—种“高山流水遇知音”

① 德文原文为：“Sie nehmen die ganze Natur zusammen, um über das Einzelne Licht zu bekommen, in der Allheit ihrer Erscheinungsarten suchen Sie den Erklärungsgrund für das Individuum auf. Von der einfachen Organisation steigen Sie, Schritt vor Schritt, zu den mehr verwickelten hinauf, um endlich die verwickeltste von allen, den Menschen, genetisch aus den Materialien des ganzen Naturgebäudes zu erbauen. Dadurch, daß Sie ihn der Natur gleichsam nacherschaffen, suchen Sie seine verborgene Technik einzudringen. Eine große und wahrhaft heldenmäßige Idee, die zur Genüge zeigt, wie sehr Ihr Geist das reiche Ganze seiner Vorstellungen in einer schönen Einheit zusammenhält.” Schiller an Goethe (Jena, den 23. August 1794.) (席勒1794年8月23日致歌德信), in Seidel, Siegfried: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Schiller und Goethe* (席勒歌德通信集) Erster Band. München Verlag C.H.Beck, 1984. S.9.S.10. 中译文参考了宗白华译文, 见《宗白华全集》第4卷第35页,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年。

的感觉，此后书函往来，并肩合作；而到了魏玛时代，两人不但相知相得，而且也有竞争的戏仿形式，譬如《格言诗》（Xenien）的创作就是最好的例子，但这种竞争是友人间的良性竞争，而非场域争夺的利益促动。所以，总体而言，两者之间是和型关系，但也绝不排除有竞型二元的因子在。

那么如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杜甫难道不嫉妒李白的才高八斗吗？歌德会不会担心席勒后来者居上？可《威廉·退尔》原本乃是歌德辛苦收集的材料，却轻而易举地转让给了席勒，成了席勒的最后绝响的关键素材。到了最后的层次，天才人物的惺惺相惜与高山流水之情，可能不是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就像刘正风宁可全家玉碎，也不可能出卖与曲洋的友情一样，那种高山流水的悲壮，确实可以“笑傲江湖”！这就如同爱因斯坦所言，“我想知道上帝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的。对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谱我并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他的思想，其它的都只是细节问题”。<sup>①</sup>而侠客岛上的龙、木二岛主，邀请天下英雄豪杰到侠客岛喝腊八粥，目的乃是追问岛上24座石室所刻图谱的秘密，一旦破解侠客行的武功秘奥，他们就毁图沉岛，慨然西去。这就是至高的精神境界，而非俗世的那种为追求武功秘籍而不择手段，其目的不过为了称霸天下、唯我独尊，像日月神教所表述的那样“千秋万世，一统江湖”。或者，就是我们所谓“寻道”的意义！道之所存，又岂是彼俗世人等或利欲熏心之徒所堪喻？

和型二元的标志性特征是，其一主次有序；其二流力盎然；其三变常创新。和型二元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是在“超人时代”里才可能成为常态的游戏关系。所以对其特征构成需要细加界说，所谓主次有序，就是在这种“二”的关系中，仍必须知其限止，有一种结构上的主辅关系，如果每个“一”都唯我独尊，自高自大，那就必然会导

<sup>①</sup> 转引自《前言》第1页，载〔美〕阿·热：《可怕的对称——现代物理学中美的探索》，熊昆译，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

致分道扬镳，甚至祸起萧墙、反目成仇。正是因为彼此能明白自己的定位，所以使得这种二元关系能在一种动态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的结构；所谓流力盎然，也就是说作为第三维的流力因素在此结构中发展到最佳状态，它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协调的、创生的姿态，能在二元之间扮演调和角色，滋养阴阳，使得二者调和。“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将这种二元关系形容为一沟阴阳相合之清渠的话，那么这种勾连彼此的流力就是源头活水；所谓变常创渐，就是在这种二元关系的动态转化过程中，变态与常态达到一种稳定的互补、互哺、互辅状态。而这一点在太极拳的拳理中得到很细致的一个描述：“太极者，无极而生，动静之机，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曲就伸。人刚我柔谓之走，我顺人背谓之粘。动急则急应，动缓则缓随。虽变化万端，而理唯一贯。”（王宗岳《太极拳论》）

如果说用文人做例子可能显得有些过于阳春白雪，那么就拿最平常的例子来说，在无以数计的夫妻关系中，真正能达到和型二元者仍恐是凤毛麟角。表面上“相敬如宾”者或不少，但真正能“举案齐眉”“白头偕老”者能有几？如谓不信，即便就小说家言的理想虚构来说，表现明显的是譬如韦小宝与妻妾之间的关系。虽然他有七个夫人，但真正能谈得上“和”的，恐怕仍是很难数得上来。公主不用说了，基本上就是皇帝之妹（虽然是假的），我行我素、刁蛮无理。即便表明看韦小宝与双儿的关系最亲厚，恐怕仍离和颇远，而近于“附型关系”，韦小宝是绝对有话语权力的支配地位；曾柔、小郡主，其本质也都类似，都是失去了自我主体地位的。而韦小宝与阿珂的关系，则近于“战”，因为彼此虽算是师姐弟，但阿珂对他却并无真实情感，所以围绕着郑克爽而展开一系列闹剧；但最后却是由战而附。为什么？阿珂对韦小宝的态度有几个转折，怀孕之后与生子之后乃是很重要的触机。方怡、苏荃其实也都类似之。当然金庸在处理《鹿鼎记》中的男女关系时相对较弱，描写远不如其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射雕三部曲》中的细腻。但我们要注意到，这种二元关系绝不是孤立存在的，他是

在一夫多妻这个更大的语境中存在的，所以其中妻妾对丈夫的依附是绝对的，所谓“琴瑟和谐”更多出于一种理想表述状态而已，这种“阴阳二元”是具有制度性的规定性影响的。

总而言之，和型二元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种特殊状态，它在人类史上始终处于一种极少实现的时候，故此不是一种常规状态。但它确实是一种理想状态，表明了人类希望超于人，实现“超人”理想的那种诗性表述。

## 二 战型二元

战型就是二者你死我活的关系，就是不能相容，彼此斗争，甚至到鱼死网破的结局。这一点以基督教思维最为典型，所以有论者对此做出非常典型的概括：“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sup>①</sup>而犹太教、伊斯兰教多少也有类似的成分在，就是他们必须树立一个敌对的他者，在这样一种你死我活的二元对立中来确立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故此不仅是基督教要求绝对崇敬上帝，就是伊斯兰教也有其强烈排他性的特征。有趣则在于，正是在东西方的交接之处，产生了这样的势不两立的二元论，为何？

以宗教关系为例，发生在西方的“三教关系”与东方的“三教关系”是颇不一样的。在《智者纳旦》里，设计了一个著名的谜面，即苏丹萨拉丁（Saladin）召见纳坦提出一个问题，在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这三种宗教之间，只有一种该是正确的，让纳坦判断并论证。纳坦

<sup>①</sup>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 L.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 - A Global History*），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讲述了一个戒指的故事，即一个父亲要传给三个儿子，该如何处理呢？结果是打造了难分真假的另两只。由此，纳坦的回答是：“父亲让人做戒指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两个戒指同真的戒指区分开来，所以我无法区分宗教也是可以原谅的。”<sup>①</sup>这当然只是莱辛通过文学人物的理想描述，落实在实际当中，三教彼此根本无法相容。所以萨拉丁会说出这么一段话：“穆斯林是吾，/之间有基督。/宗教有三家，只容一真出。”<sup>②</sup>而在中国，则有极为著名的“三教合一”现象，也就是儒、道、佛的合流现象。同样，在东南亚国家，我们可以找到更为有趣的多教合一，譬如那里还不仅有儒教、佛教，还有印度教，还有伊斯兰教，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相融而共生，彼此和睦相处呢？

钱穆曾强调：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sup>③</sup>。这又是简单地将中西思维方式加以概括叙述的一种方式，也可见出大家的语重定论的气象。但如果更深入地分析之，则可以有更深刻的理解：“西方岂止是重分别，而是重对立，重斗争。这源于基督教文化的‘二元主义’（dualism），即将任何事物都看成是两个性质相对的实体组成，如善与恶。二元主义认为两个实体一正一反相斗，乃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中国人则相反，认为正反之间本身便有合或相互包容，并不以‘斗’为任何事物发展的原动力。比如中国人不会为了强调男女的不同而臆造出男为‘非女’或女为‘非男’的概念。乾道成男，坤道生女，天经地义，

① 德文为：Soll / Mich bloß entschuldigen, wenn ich die Ringe, / Mir nicht getrau zu unterscheiden, die / Der Vater in der Absicht machen ließ, / Damit sie nicht zu unterscheiden wären.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75 (vgl. Lessing-W Bd. 2, S. 278) <http://www.digitale-bibliothek.de/band5.htm>] 莱辛《智者纳坦》，载〔德〕莱辛：《莱辛剧作七种》，李健鸣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440页。

② 德文为：Und ich ein Muselmann./ Der Christ ist zwischen uns. – Von diesen drei/ Religionen kann doch eine nur/ Die wahre sein. – [Werke: Nathan der Weise. Lessing: Werke, S. 1769 (vgl. Lessing-W Bd. 2, S. 274)]。此处作者自译，原文为诗体。参考：“我是个穆斯林。基督徒处于我们两者之间。——但在这三大宗教中，只能有一个是真正的宗教。”莱辛《智者纳坦》，载〔德〕莱辛：《智者纳坦（研究版）》，朱雁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③ 《序》，载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页。



没有蓄意制造的概念混乱。二元主义则强调有甲必有非甲，两者相斗，产生乙，并照此规律无限进行下去。”<sup>①</sup>这个解释无疑是很有见地的，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有两个传统，一是古希腊传统，一是基督教传统，所谓“两希文明”是也。这里强调的希伯来渊源的基督教，确实不无道理，因为“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sup>②</sup>

基督教是西方世界的根本宗教，它虽发源于耶路撒冷，但却流转到欧洲语境，不仅在欧洲成为主导型宗教，而且也在北美、澳洲，甚至后来的拉美生根发芽，对于亚洲、非洲这样本来有自己宗教和文化传统的大洲也产生极大的渗透乃至影响，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手法与业绩更是近乎举世公认。说到底，基督教之征服欧洲或西方，乃是其观念与元思维方式的实践体现，当然还有一种思路，就是强调基督教本质上还有“崇尚理性”的特点，所谓“理性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塑造了独一无二的西方文化和制度。其中最重要的胜利发生在基督教内部，世界各大宗教都强调神秘与直觉，唯有基督教把理性和逻辑作为探索真理的指导”。<sup>③</sup>在我看来，或许正是这种理性宗教模式推动了基督教的唯我独尊意识以及其与他者相处的“战型二元”思维。

有论者认为，西方传统的世界观“呈现出二元论(dualistic)的基调。西方人对自然人事，都是二元对立的思维倾向，亚里士多德所创始而通用二千余年的是非对错二值对立的古典形式逻辑，可为明证；至如客体与主体，理想与现实，本体与假相，天启与理性，心与物，社会

①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13页。

②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 L.S.)：《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The World since 1500—A Global History)，吴象婴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11-12页。

③ [美]罗德尼·斯达克(Stark, Rodney)：《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The Victory of Reason: How Christianity led to Freedom, Capitalism and Western Success)，管欣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与个人，灵魂与肉体的对立等等，亦不过是举其荦荦大者而已。尤其在宗教信仰与形上学思想方面，西方人更是执守二元论立场，因而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完全分离，天国与地域断然隔绝，无论就存在意义或价值意义言，前者均较后者为真为高。”<sup>①</sup>当然值得指出的是，“西方近代人就在这种二元论世界观的思想气氛下，一方面倾力追求现实生活的发展，物质文明的进步，为此不惜耗尽毕生精力，探求自然，征服自然，并且通过科学技术的改进，提高生活的水准。至于精神所须寄托的境界，则依照二元论世界观思想，另在现实世界之外，构筑真善美价值理想所能承兑的超越世界（就哲学言），或是天国（就宗教言）。在凯撒之国尽量生产地上面包；同时另在上帝之国寻觅俗世所无法供给的天上面包，俾便内在生命能有安然寄寓之所。”可问题在于，“一旦整个西方社会有了重大变革（譬诸战争、大革命、经济扩张竞争），或遇有‘异端’思想的冲击（譬诸科学主义世界观的抬头，或经验论、泛神论等反二元论世界观的哲学思想得势），立即足以涣散人心，动摇或甚至摧毁整个传统的二元论世界观，而使人存在意识涣散人心，动摇或甚至摧毁整个传统的二元论世界观，而使人存在意识本身游离失所，随时随地有实存丧失的危机存在”。19世纪时，克尔凯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等“异端思想”的出现，“便是在西方二元论世界观思想摇摇欲坠，到处弥漫着世纪末的虚无主义气氛下，不约而同地开拓出实存主义的理路，欲以拯救西方人的精神危机，重寻失落了的精神故乡”。<sup>②</sup>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则典型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在他看来，“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

① 《西方二元论世界观的崩落与实存主义的兴起》（1962年），载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58页。

② 同上，第160-161页。

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sup>①</sup> 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就是将政治、权力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统合在一个“文明”的框架下，尤其是西方-非西方的思维方式，显出其二元论思维特征仍是挥之不去，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他将世界文明分为7-8个类型，将西方文明归为一类，而将诸如中国、印度、阿拉伯、非洲等分开设置。要知道，“人不只是属于同一种类的个体，他们还属于各种各样特殊的集体，他们出生于其中并在其中活动。今天最强大的集体被称为国家，也就是政治和文化接近（但不是完全）完美的重合。属于人类和属于某个国家并不一样，两者之间甚至还存在潜在的冲突，当某一天我们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冲突就会显现。人，在词义上，是从伦理层面来说的；而公民行为却属于政治层面。不能消除人类生活着两方面的任何一方，也不能把一方简化为另一方——应该意识到这种有时是悲剧的双重属性。同时，彻底分裂两方，把它们禁闭在从不交流的两个空间中同样也会很不幸”。<sup>②</sup> 作为一种概念结构的文明恐怕也同样可按照这个思路延伸思考，如此亨廷顿那种简单的由二元论思维推展而来，同时又暗藏政治博弈的策略计谋，则自然可以迎刃而解。问题在于，“世界不是你想象”！一方面可能确实存在基督教西方的唯我独尊、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但另一方面其实也不太可能完全回避那种一身多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渗透、连环相扣的情况。当然此处我们仍聚焦于“战型二元”。

这一点不仅是在现实世界中得到充分印证，而且也表现在小说世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 (Huntington, Samuel P.):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周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第8页。

② [法] 茨维坦·托多罗夫 (Todorov, T.): 《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Nous et les autres - La réflexion française sur la diversité humaine), 袁莉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351页。

界中。譬如韦小宝在庙堂、江湖之间的状态变化，从最初的懵懂无知到游刃有余再到无法调和，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天地会众兄弟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皇上说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头船么？’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sup>①</sup>最后他选择的是撤出，即从这样一种二元关系中逃离，因为这种二元始终是处于战型二元，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便是聪明伶俐、善“捣糨糊”如韦小宝，都无法始终如鱼得水。所以作者安排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夫妻八人依计而行，取了财物，改装来到扬州，接了母亲后，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那逍遥自在的日子。”<sup>②</sup>这显然是一种过于理想和一厢情愿的情节设计，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无论是庙堂，握重权如康熙帝者，还是江湖，譬如那些谋求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豪杰，他们焉能容得韦小宝退隐江湖？正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鹿鼎记》其实是带有了相当乌托邦精神的。这点倒是《笑傲江湖》里说得明白，刘正风因与魔教长老曲洋因乐相交，乃希望金盆洗手，然而左冷禅设下毒计，环环相扣，终究逼得他满门血洗、无一生还者<sup>③</sup>。在战型二元关系当中，和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彼此间的结局必然是“你死我活”。

战型二元的特征很明显，就是其一非此即彼；其二真理独吾；其三暴力为盾。因为坚信真理唯一，且绝对只掌握在自家这边，所以必然要求对方按照“非此即彼”的原则进行选择，这一点像满清入关要求汉人剃发一样，既可笑又简单，但放置在历史语境中则显得特别真实而残酷，就是“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但所有这样没有极端

① 金庸：《鹿鼎记》第5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953页。

② 同上，第1978页。

③ 不过即使如此，金庸仍表现了极为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就是让刘正风在临死之前，仍与曲洋同奏一曲《笑傲江湖》，并有这样的表述：“今后纵然世上再有曲洋，不见得又有刘正风，有刘正风，不见得又有曲洋。就算又有曲洋、刘正风一般的人物，二人又未必生于同时，相遇结交，要两个既精音律，又精内功之人，志趣相投，修为相若，一同创制此曲，实是千难万难了。”但这种人格境界，却是更多只停留在文学世界里的，让人向往的成分居多。金庸：《笑傲江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册第217页。

强大的暴力机构和武器作为后盾的话，那也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而已，所以这里再次显示出那条元规则的无远弗届——“暴力最强者胜”！

### 三 附型二元

附型二元就是一种依附型的二元关系，它使得两者关系是一种彼此支配、情感乃至人身依附的特殊关系，如同战型二元往往以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为选择一样，附型二元其实是早就预设了一种不战而主的方式，在这个二元关系中有着近乎先天的主从或支配关系，说“主奴关系”或许过于直白，但主导和服从的原则是这一二元关系的实质。在中国的表述里，最典型的当然是君臣关系，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说得就是这个道理。

诸葛亮和刘备的和型二元关系是基本定位，但并不意味着其中有其它因子的出现和波动，譬如在关羽、张飞之死的问题上，就发生了激烈冲突。先是关羽有走麦城之失，乃有帝相之间为是否伐吴的激烈冲突，刘备考虑的首先是兄弟之义，而诸葛亮考量的则是蜀汉大业，这其中有着相当的错位关系。而一旦张飞也被害，那么“伐吴”就成了必然抉择，到此时节，诸葛亮也只能缄默无语，退而离都。所以说到底，在这样一种二元关系中，其本质仍是“附型二元”，在具体的利益冲突中，作为臣子的诸葛亮只能选择默认，选择退让，选择服从。儒家的这种支配关系表现得很明显，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得也就是这套关系。

这一点在晚明灭亡的过程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起初满清入关之后，士人选择投降者不少；可一旦剃发令下，江南展开大规模的抗清斗争，而且很多是降而复反。为什么，这需要从文化上找原因，其中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在于是“亡国还是亡天下”，改朝换代固然是一种变化，但这还不是根本性的，对于像冯道那样的人物来说历仕多朝并不以为耻；可一旦是要让你剃发结辫，这就意味着中国文化之亡，这是比亡

国还要更了不得的大事。

但附型二元关系往往不是绝对的，而是发展变化着的，它不像战型二元那样相对稳定。就如同国际关系中的“依附关系”一样，有些小国依附大国，但它又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以利益为选择的。譬如英美之间的关系可做如此看，但英国的依附美国，却并没失去自己的立场，在关键时刻仍坚持维护自己的利益，譬如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件事情上，虽然美国施压，但英国仍在西方阵营里带头参与，这很典型地体现了英国的原则“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尔语）依附理论（the Dependency Theory）由阿根廷学者普雷维什（Prebisch, Raul）于1960年代提出，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的，甚至是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在世界经济领域里有中心-外围的层次之分，其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世界经济中心，发展中国家处于外围，被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卡多佐（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Silva, 1931-）等就明确表示：“依附的概念直接反映经济和政治体系的运行情况及其生存的条件，显示的是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不仅反应各个国家的内部情况，也包括外部情况。”<sup>①</sup>所以依附现象不仅是单个的二元关系，而且也是连环关系，存在着连环依附现象。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红楼梦》的关系中，丫鬟是依附于小主子的，小主子又依附于大主子，荣国府最后依附的自然是主人贾政，而贾政自然也有依附的更大靠山，最后则是依附于皇帝。

附型二元的特征相对清晰，总结之：其一主次序限；其二是向心力聚；其三是冲突内蓄。就本质而言，这也很难说是一个稳定性二元结构。

① [巴西]卡多佐（Cardoso, Fernando Henrique Silva）、法勒托（Faletto, Enzo）：《拉美的依附性及发展》（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n），单楚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 四 竞型二元

如果根据二元三维的基本结构模式，则必须开出一个第三维来。那么这第三者是谁？或许可以有一个所谓的“竞型二元”，就是指阴阳二元关系表现出的介于附型、战型二者之间的一种类型。所以当是兼容二者的既有相互为战的争斗性一面，也有趋向求和的宽容性一面。如此则“竞型二元”的概念则可以成立，这是一种良性状态。

只要是二元关系，就不会是没有矛盾的，就不可能都是天生的和事佬，除非都是木头人。所以，冲突是非常正常的现象，矛盾也是处处皆在的事实。但古语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或者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实涉及的都关乎二与三的关系。所谓“三人成虎事多有”，一旦人多，就必然事杂，难以平心静气地细商琢磨。达仁道夫（Dahrendorf, Ralf, 1929-）曾说过：“社会现象本身充满着辩证关系，往往同时呈现出相互矛盾的二重层面：即稳定与变迁、整合与冲突、功能与反功能、价值共享与利益对立，等等。因此，既要从社会均衡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又要从社会压制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尤其要加强发展社会压制模式理论。”<sup>①</sup>在他看来，矛盾性几乎贯穿于社会现象之中，所以需要从社会现象不同类型的角度来观察，譬如强调的社会均衡、社会压制的视角。

在竞型二元关系中，冲突是一个关键因素，甚至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第三维的某种标志性符号。正是由于冲突的存在，二元关系的变易过程得以发生，附、竞、战三者可以相互转化，甚至像和型二元这种理想状态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达致的。就社会现象来说，“冲突是由于权力分配引起的，而不是由于经济因素引起的，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各利益集团各司其事，这样虽时常会有一些小冲突，但却限制了严

<sup>①</sup> 转引自林荣远《译者的话》，载〔英〕达仁道夫（Dahrendorf, Ralf）：《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重冲突的集中爆发”。<sup>①</sup> 这里强调“权力分配”的因素是对的，但对经济因素的深层作用似也不宜太过忽视。就二元关系而论，它也可以是被理解为多层次的二元关系，譬如一个下级二元关系始终是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语境背景之中，笼罩在一个上级二元关系之内的。

竞型二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要彼此间不是你死我活的那种极端态度，又没有先天性的那种依附关系的规定性，就很可能形成一种竞型关系。譬如胡适、鲁迅是一种竞型关系，胡适、李石曾也是，他们在北大场域里既是同事，又彼此各为群体领袖，相竞不下；胡适、吴宓的关系更典型，从文化意义上来说，两者都是留美归来，对传统文化有认知和基础，但却态度迥然有异，前者为新文化派领袖，要求扫荡旧传统；后者则捍卫旧文化，曾经有过针锋相对的批评：“近年国内有所谓新文化运动者焉，其持论则务为诡激专图破坏，然粗浅谬误与古今圣贤之所教导，通学哲士之所述作，历史之实迹，典章制度之精神以及凡人之良知与常识悉悖逆抵触而不相合。”<sup>②</sup> 但总体看，两者尚未落入小人争斗的窠臼中去。这点从吴宓先在东南大学，之后经东北大学短暂中转后落户清华的作为，更可见出一斑。表面上是两者——曾留学哈佛大学的吴宓与曾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其中却蕴含着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派系之争，再往深处追，则是美国导师杜威（Dewey, John, 1859-1952）与白璧德（Babbitt, Irving, 1865-1933）的差异，更反映出其时美国文化场域的两大潮流，即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新人文主义（New Humanism）的分野。当然我们会发现，这种二元关系又始终是处于一种平行场域中的，甚至是平行的“以胡为轴”的多重二元关系。或者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之为静态竞争，就是大家各自安于现状，以说理讨论为主要方式，甚至是连在语言和意

① 转引自林荣远《译者的话》，载〔英〕达仁道夫（Dahrendorf, Ralf）：《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林荣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② 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原载《学衡》第4期，1922年4月，此处自孙尚扬等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见上也不发生直接冲突的，譬如陈寅恪就很少公开表示对当代学人的意见；动态竞争，则往往是表现出明显的“你来我往”的相互过招，必须面对面的发生利益冲突，甚至恶性竞争的交战情况；更多的或许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常态竞争，也就是彼此都动用一定资源，但以不超出常规伦理、法律制度限制为界限。在政治场域则往往表现为战型二元，譬如蒋介石与陈炯明之争，蒋介石与汪精卫之争，蒋介石与毛泽东之争。一般来说，本来应该是彻底的你死我活，但在处理政治对手时，蒋氏却表现出某种“静气”，真地被他动用暴力手段解决的对对手不算太多，像张学良也算一个较典型的例子。这或也可被视为一种动态竞争的关系。

或许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联频的概念。就侨易学来说，考察各种事物单元之间的变化与不变关系是核心内容。联的意思不难理解，联系联结的意思；频率、频频、频道，都是指一种映像的再射，也就是说，通过事物单元之间的侨动，使相应的频道联系在一起，实现侨易过程中的特定精神生成阶段。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教育而存在，甚至首先是通过教育而得以发展成一个社会人，但这其中的过程又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既有教育制度对上层建筑如意识形态的反映，同时也有教师个体通过感召力，知识渠道介绍进行的影响，还有其他孔道以及学生本身生性的选择，说到底是一种合力作用。我们应努力通过多思维来把握这种侨易联频现象，并努力洞察其后的精神性变化因尤。承认差异，重视间距，凸显联频<sup>①</sup>，即事物之间本来存在但往往易被忽略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物质和精神之间建构关联的线索，如此可展现出侨易现象的意义。

竞型二元的特征是，其一承认冲突；其二战和皆空；其三市场原则。

① 物质和精神是否截然可分？是否可以一分为二的那么清楚？或者始终应将其作为一种二位一体的结构性关系，甚至是一种三位一体，因为二元三维始终是一个基本原则，可否将这个第三维定位为联频？或者侨易？这样要深入思考。在低端的物器形态层面，则教育物器是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该从最具体的社会层面考察诸如教育器物，教育行动等可以把握的，通过惯常可操作的学术方法，如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进行研究，进而带出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等高端问题。

总体来说，竞型二元更接近于人类的生存常态，即事物的动物性一面，也就是达尔文的学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表达得或许略显极端，但生物通过竞争而获得生存权则是一个不争事实。完全没有竞争的社会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否就要将其演绎至极端化的你死我活的暴力战争，则可以打个问号。人类发明的市场经济原则或许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然而世界至今也仍未太平，所以求道之路仍艰难且漫长。

## 五 接触空间与“三维呈现”

当你承认二元思维基本结构的时候，其实最基本的那些伦理价值就已存在那里了。譬如阴阳与雌雄，男女，人类的繁衍，父母与子女后代的关系，万物生长。联频固然是一种处理物质与精神之间关系的中介，即三，但是否也可以进一步拓展？最初可能就是事物单元，譬如不同性别个体之间的关联？或许我们要做的，就是破解上帝造世时所根据的逻辑链，它可能就是非完全理性的。爱因斯坦追问：上帝是怎么想的？我怀疑：人类真的是从猿猴演变进化而来的吗？

我想强调的是，“和能生三”，二元关系最重要的一环是能否开出第三维，是能否产生新的种子。显然并非所有的二元关系都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譬如“战型二元”肯定就倾向于他我不两立，这种关系其本质就是西方二元论思维的“你死我活”，非此即彼，二者必须是二者择一的关系，必须找出一个绝对相异的他者来，这样才能确立自身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当然，这种二元关系的三型划分，只是我们为了认知事物而不得不贴上的名物标签而已，在实际运作中，任何事物都有其自身内在的规律在，有变有常，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彼此之间也有其相互转化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以动静相生的观念来看待事物。而就良性二元关系的达成来看，其中的核心因子仍在第三维开辟，各家视角不一，但隐约对此的指向则无大异。譬如德里达（Derrida, Jacques, 1930-2004）曾说过：“既然整体是系统的，而其

自身又是分裂的，那么，我们必须提出一种双重表示，一种双重书写（也就是一种自身多样性的文字）以及我在“双重表示”一文中所说的“一种双重科学”：一方面，经过一个“翻转”阶段。我一直强调这个翻转阶段的必要性，而人们也许太急于不相信它了。要公正地对待这个必要性，就要认识到在古典哲学的对立中，我们所处理的不是面对面的和平共处，而是一个强暴的等级制。在两个术语中，一个支配着另一个（在价值论上、在逻辑上，等等），或者有着高高在上的权威。”<sup>①</sup>德里达进一步果然就走向了二元的关系处理问题，他似乎也试图消解对立：

要消解对立，首先必须在一定时机推翻等级制。忽视这一翻转阶段就是忘记了对立间相互冲突和上下从属的结构。因此，如果人们迅速进行中和活动，但在实践中却留下了先前未被触及的领域，没有抓住先前的对立，那么就会失去任何有效地干预该领域的手段。我们知道什么是直接跳过对立和用既非这个又非那个的简单形式进行抗争的实际结果（特别是政治结果）。当我说这一阶段是必要时，“阶段”一词也许不是最确切的。它不是一个以年月为阶段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既定阶段或者为了继续其他事情而可以翻过的一页。这一阶段的必要性是结构性的，因此是一种无止境分析的必要性：二元对立的等级制总是重建自身。不像那些没有等到死亡就消失的作者，翻转的绝不是个静止的时机。<sup>②</sup>

这种抽象表述似乎要给出一个较为普遍性的解释，所以提出了“中和”的理想型结果，但德里达无疑很有策略性和现实感，他好像意识

① [法] 雅克·德里达 (Derrida, Jacques)：《多重立场——与亨利·隆塞、朱莉·克里斯特娃、让-路易·乌德宾、居伊·斯卡培塔的会谈》(Positions)，余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47-48页。

② 同上，第48页。

到那种直奔目标、一蹴而就的中和活动不太可能如愿以偿，故此引入了结构体的概念，强调作为外围因素的等级制制约。而将二元对立作为一种等级制加以凸显的时候，德里达显然更多地将“权力话语”等因子考虑进来。但问题在于，这种等级制是长期形成、如影随形、潜意识中存在的，如何才能真正突破之？这有点像附型二元关系，彼此之间就是一种明显的等级关系，即使是对立其本质恐也不仅是对立而已。翻转阶段似乎可以理解成接近我们所谓的“第三维”，即如何在二元之间插入一种可以调试的张力因素，德里达想用翻转而突破结构性的权力障碍，是一个深刻的想法，但如何破题却并非易事。

二元类型表

| 名称   | 概念   | 特征                    | 举例           | 注释  |
|------|--|-----------------------|--------------|---|
| 战型二元 | 指二元关系表现为一种水火不容的绝对对立关系。   | 其一非此即彼；其二真理独吾；其三暴力为盾。 | 基督教 VS. 异质文明 | 思维方式陷于一种极端化。  |
| 附型二元 | 指二元关系处于一种绝对依附关系，一方对另一方表现为一种主要支配关系。   | 其一主次序限；其二向心力聚；其三冲突内蓄。 | 君臣关系         |   |
| 竞型二元 | 指阴阳二元关系表现出的介于附型、战型二者之间的一种类型。所以当是兼容二者的既有相互为战的争斗性一面，也有趋向求和的宽容性一面。冲突是一个关键因素，甚至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第三维的某种标志性符号。 | 其一承认冲突；其二战和皆空；其三市场原则。 | 学衡派 VS. 新文化派 | 重视联频概念。联指联系联结；频指映像再射，即通过事物单元之间的侨动，使相应的频道联系在一起，实现侨易过程中的特定精神生成阶段。 |
| 和型二元 | 二元关系的一种特殊状态，也是一种理想状态，双方处于一种高度和谐。   | 其一主次有序；其二流力盎然；其三变常创新。 | 歌德-席勒        | 不属于一般分类，而属于理想状态。  |

相类似的，譬如施瓦布（Schwab, Gabriele）提出过“接触空间诗学”（contactspace-poetry）理论，其步骤为三层面：“首先，她提出阅读的心理分析模式，使心理分析文学理论发出新的声音；继之，她将阅读视为独特的文化接触形式，探索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边缘地带；最后，她聚焦于西方现代暴力历史及其创伤，探讨暴力、创伤与叙事的关系。”<sup>①</sup>这里最重要的是其对两个领域之间的接触区的发明。而普拉特（Pratt, Mary Louis）则提出“接触区域”（contact zone）概念，此指“迥异的文化相遇，冲撞，和互相对抗的社会空间，这些文化常常处于极不均衡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中，比如殖民主义和奴隶制度，或者是这种关系的延伸”。在该空间内，“从属的或边缘的群体如何从支配的或大都市的文化传播过来的材料中进行选择和创制。虽然被征服者不能自如地控制统治者文化所施予他们的东西，但他们确实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如何应用，他们赋予这些东西以什么样的意义”<sup>②</sup>。更富启发性的或许是霍米·巴巴（Bhabha, Homi K., 1949-）提出的“第三空间”（The Third Space），后殖民语境中的这个概念一般指“超脱于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空间”<sup>③</sup>，按照巴巴的说法，“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间隙性空间’、一种间隙的时间性，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分裂的主体。”<sup>④</sup>

二元关系作为一种核心概念建构，绝不可能仅仅是简单的或战、

① [德]加布丽埃·施瓦布（Schwab, Gabriele）：《文学、权力与主体》（*Literature, Power and Subjectivity*），陶家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封底。

② Pratt, Mary Louis: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Second edi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7. 中译文引自周云龙《侨易观念：第三极智慧与起源的诱惑》，载《跨文化对话》第33辑第16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③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④ Bhabha, Homi: “Unpacking My Library … Again”, in Chambers, Iain & Curti, Linda(ed.): *The Post-Colonial Question: Common skies, Divided Horizon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204. 中译文引自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0页。

或竞、或和的静态二元关系，而是一种动态的可能在发生不断变化关系的二元。之所以如此名之，乃贴标签之无可奈何，但具体到问题的内部细节，则需要有“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之意识，也就是事物总是内含向相反方向转换的因素，老子所谓“反者道之动”也。但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也未必就仅仅局限于二元两极的关系，其中还有相关的步骤，尤其是第三极的发现，或者就是一种“侨易二元”的关系，用我的话来说就是“流力区”的出现，在阴阳二元之间，有一部分是相互接触的、同时也是作为相互生成力的流力区域，它不仅是二元之间的一个接触区，同时也是属于阴阳本身的母体区；也就是说，在接触、互动、交融的过程中，同时它也在反馈于母体本身，是两个文化互动区。这就有点像改革开放的深圳，一方面是与港澳、西方接触的窗口，作为中国的经济开放代表而与西方技术、资本与文明发生交流；反之，也作为改革窗口与内地发生互动，将西方经验传输回内地。所以改革时代的深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流力区。程抱一（Cheng, François, 1929-）特别强调中国的三元思维模式：

中国思想体系是三元的，比如儒家的“天地人”，道家的“阴阳冲气”。一元的文化是死的，是没有沟通的，比如大一统、专制；二元是动态的，但是对立的，西方文化是二元的；三元是动态的，超越二元，又使得二元臣服，三元是“中”，中生于二，又超于二。两个主体交流可以创造出真与美。这里二元是指两个追求生命真谛的主体，是朝向生命的。仇人相见不是二元，和恶的交往也不是二元。中国文化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元的，所谓“一以贯之”，大一统，但是这只是主治，其运行方式是三元的。两个主体对话，交流创造出新的生命，而不是合二为一，回到“大一统”甚至专制。其实神也不是神圣的“一”，神创造出万物也是为了创造交流者。比如艺术都是三元的，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和自然对话的产物，三

元的命题很重要。<sup>①</sup>

他认为西方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而中国的思维方式则是一元到三元，守中（中庸之道）是要则。前者可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对主体观念可追溯到柏拉图），后者则从老子到孔子是相通的<sup>②</sup>。三元也未尝不可理解为一种表述方式，类似于庞朴所提的“一分为三”，但如果我们更愿意承认有一种人类普适性的范式的话，那么用二元表述或许更能提供一个对话的前提，二元三维其实也不妨就理解为二元、三元之间的一种调和表述。程抱一强调中国文化里的“中”之核心要义，但非乃折中、中庸、妥协，而是要“把作为主体的人放入天地宇宙间，和宇宙交流”，乃《尚书》之“皇脊”、《中庸》的“天地之大道”、冯友兰所谓“中”。<sup>③</sup>在他看来：“西方人从主体出发，比如精神分析就是把病人从孤独和顽念中解脱出来。而中国文化不是以征服性的方式对待宇宙，中国的宇宙观里是天地是有机的，是可以沟通的，不是主体征服客体，而是主客体之间的对话。但也不是主体化入客体。这是唐代诗人、北宋画家达到的境界。中国人对生命之间、事物之间发生的微妙关系很敏感，研究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以及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文化传统。”<sup>④</sup>这些表述当然都是很有道理也很有见地的，但我还是更倾向于以世界性为标的，强调建构西方、东方的二元关系，实质上是为了构建最后那个最为世

① 晨枫采访并整理《中西合璧：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载〔法〕程抱一（Cheng, François）：《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杨年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② 陈彦《生命、激情与中西文化对话——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访谈》，载《文景》2004年第5期第6页。

③ 晨枫采访并整理《中西合璧：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载〔法〕程抱一（Cheng, François）：《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杨年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317页。

④ 晨枫采访并整理《中西合璧：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载〔法〕程抱一（Cheng, François）：《天一言》（*Le dit de Tianyi*）第317-318页。

界的“一”，即普适性的元一。当然仅仅是有二也不够的，还需要构筑出那个三来。侨易就是寻求这种内在逻辑的思维和方法，是否还需要加上伦理道德观的内容？

当然还必须提及“小二元三维”和“大二元三维”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分析具体语境中问题的时候，必然是要降落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域之中的，它的背景、场域、问题都是有限的，有特殊性的，但它必然是处于一个宏阔语境的“大二元三维”之内的小问题；当然在微观与宏观之间如何架设桥梁，是一个如何把握“度”的问题。还可以提及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或者可借用“六度关联”的思路来理解，也就是在一个“下级二元三维”关系之上，必然有“上级二元三维”关系，这一点有论者在分析《神雕侠侣》中的二元对立关系时讲得颇清楚：

建立一个相反的二元对立之后，再对“有情”与“非情”各自进行分析，便又有新的二元对立。在“有情”之内，若对儿女私情肯定而执实，我名之为“多情”；若否定而抹煞儿女私情者，我名之为“绝情”。于是，在“有情”之内，便另有一个相对的二元对立：“多情”与“绝情”。<sup>①</sup>

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下层次不同建构的二元关系，即在一个子概念下还可进一步区分其子概念，并且以二元关系为主轴。在杨过与小龙女身上，本来不是战型二元关系，但也绝不是和型二元关系，虽然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仿佛是神仙眷侣，但若从性格角度看，是否能真的琴瑟和谐、白头偕老，却是值得打个问号的。对这一点其实金庸应该是有意识的，所以他要安排两人之间的艰苦坎坷、历尽劫波。其实两人的关系反映出一种典型的二元关系转换过程，从最初的

<sup>①</sup> 陈沛然《情之探索与神雕侠侣》，载苏士登其、温瑞安等：《金庸茶馆》第4卷第156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



小孩依附的附型关系；再到杨过长大成人之后的“青春男女”，应算是竞型关系了，但这个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分分合合，直到绝情谷的“十六年后，在此相会，夫妻情深，勿失信约”！再到和型二元的初现（虽然我们仍会有疑问，气质个性真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改变的吗？）。虽然这个案例表现出二元关系的多样性和可变性，但仍想强调的是，二元关系的类型不仅适用于个体，而且也作用于群体、共同体。不仅对文化生命体的二元关系如此，对作为器物载体的二元关系亦然，也就是太极图的阴阳鱼效应是普遍性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开出流力区域中的“接触空间”，进而使得三维充满生命张力，如此二元三维的整体结构得以成立。